

14108110
广西历史资料

广西历史人物传

莫乃群主编

第三辑

1982年·南宁

目 录

晋·嵇含与《南方草木状》	俞德华 (1)
隋·令狐熙	李炳东 (10)
宋·余靖	陈业强 (15)
宋·冯京的籍贯和生平	黄文达 (20)
宋·苏 辙	骆鉴清 (29)
宋·黄庭坚	吴天佑 (40)
宋·张 栻	刘慧芳 (49)
宋·李曾伯	刘寿保 (57)
宋·张天宗	李干芬 (61)
明·李 璧	周天仕 (65)
明·林希元	高言弘 (72)
明·韦银豹	高言弘 (78)
明·谭公柄	覃宝丰 (85)

- 明·方以智.....秦慰俭 李 瑶 (89)
- 明·李定国.....周岳佑 (98)
- 清·于成龙.....黄旭光 (106)
- 清·马雄镇.....粟冠昌 (112)
- 清·陆生楠.....昭 民 (116)
- 清·陈宏谋.....陆启琮 (120)
- 清·周德润.....蓝 阳 (137)
- 清·王鹏运.....李 微 (146)
- 清·秦日纲.....饶任坤 (156)
- 清·谭绍光.....黄成授 (165)
- 清·陈玉成.....陆炬烈 (171)
- 清·李世贤.....饶任坤 (187)
- 清·李俊良.....张 胤 (200)
- 清·康有为在桂林.....昭 民 (204)

嵇含与《南方草木状》

俞德华

西晋时曾任广州（辖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高凉等郡）太守的嵇含，留下他所撰的《南方草木状》一书传世。《南方草木状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文献之一，并成为研究西晋以前岭南历史的一种重要资料。因此，嵇含的名字印入广西的历史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
嵇含字君道，西晋譙郡铨（今安徽省宿县西南）人。出身于仕宦之家，祖父曾任徐州刺史，父亲官至太子舍人。他作为晋惠帝侍中嵇绍的从子（侄儿），与绍共居，甚受宠爱和教养，得到嵇绍“抚恤如所同生。”^①嵇含自幼聪敏，勤奋好学，善写文章，深受嵇绍忠君思想的影响，养成谨慎求实、敦厚守善、厌恶流俗、刚直不阿的性格。他居住巩县亳丘，乃自号“亳丘子”，家门叫“归厚之门”，居室称“慎终之室”，借以表明其人品、性格。

时势使他处于逆境。他生卒的具体年代，虽然不见史载，但从《晋书》本传看，已知他享年四十四，怀帝即位时念其死而赐谥，就可以推算他是成长于西晋初期，活动于西晋后期。西晋自武帝死后，便陷于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，酿成“八王之乱”。嵇含先后在楚王司马玮、齐王司马冏、长

①《晋书》卷八九，《嵇绍传》。

沙王司马义、范阳王司马虓军中从事，做过掾史、中郎等职，在惠帝朝中任过中书侍郎，也是惠帝弟司马炽（后来的怀帝，时为抚军将军）名下从事中郎。他力图在乱世中为帝效忠，勇斥士族奢侈逐利的淫风。当轴者往往见其忠义，或者怜惜其才，不是对他宽免，就是调职任用。如楚王玮被诛，嵇含却免于难，后被荐举为秀才，授郎中官职。弘农士族贵公子王粹被招为帝婿，馆宇甚盛，室图庄周，广集朝士，要嵇含作赞辞，嵇含反作吊文讽刺。永安四年（304年），惠帝北征，荡阴之役，侍中嵇绍身卫御车，被军人所杀，血溅帝衣。事惠帝的中书侍郎嵇含，走归荥阳，又为司马炽所录用。此后嵇含到襄阳投奔镇南将军刘弘，得到刘弘待以上宾的礼遇。不久，陈敏在江南作乱，广州刺史王毅病死，刘弘表荐嵇含为广州太守，临时持节出巡。《南方草木状》当为嵇含广州任内所撰。

关于嵇含是否到广州任职的问题，《晋书》本传说朝廷对嵇含广州的任命“未发，会弘（指刘弘）卒，时或欲留含领荆州。”《百川学海》宋本所收《南方草木状》虽亦题“永兴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将军、襄阳太守嵇含撰”，但同书自序却说：“乃以所闻詮叙，有裨子弟”，再看书中所叙，内容如此生动、形象、具体，非置身其地，亲自调查，实难以做到。不必拘泥于《晋书》本传，否定百川宋本所题，早就见诸史志。除宋本外，诸本只题“谯国嵇含”，《晋书·葛洪传》就说“洪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”，隋志《郭象集》亦说“又有广州刺史嵇含集”（按：上面两处刺史为太守之误）。清辑《四库全书提要补正》对此作过一番考订，也认为百川宋本麻沙旧版“作襄阳太守”不可信，并说“考书中所载，皆岭表之物，则疑襄阳或误题也。”胡

玉缙加按，确认隋志说，而对宋本“书端旧题，本与序跋不同，乃详载年月日，恐麻沙坊肆所为，襄阳之误，不足辨已。”本人很赞同胡玉缙的见解。依据隋志、嵇含书自序以及嵇书内容来分析，肯定嵇含曾到广州任职，书为任内所撰，是有道理的。

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文献《南方草木状》，在西晋问世，反映岭南农业经济的明显发展及其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地位，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。

地域辽阔、资源丰富的中国，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农业的国家之一。古代华夏发达的农业经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，同样著称于世。岭南地处亚热带，气候温润，雨量充沛，物种繁多，四季常青，可说是我国植物资源得天独厚的宝库。自秦汉在岭南设置郡县，中原铁器大量南输，汉人南迁也越来越多，汉越人民共同开发边陲，推动岭南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，促进南北经济交流的日益加强。于是，南方物产，特别是珍奇特产大量北传，人们就迫切需要了解岭南的植物情况。嵇含在只有五十七个字的自序里，不吝笔墨地序及：“自汉武帝开拓封疆，搜来珍异，取其尤者充贡，中州之人，或昧其状”。就使介绍今两广地区以及越南植物资源的《南方草木状》应运而生，而且大受欢迎了。

《南方草木状》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科学著作。全书共三卷，上卷记草类二十九种，中卷记木类二十八种②，下卷记

②《百川学海》宋本收嵇含书卷中“木类”，所列28种中，密香、沉香、鸡骨香、黄熟香、棧香、青桂香、马蹄香、鸡舌香、密香纸，皆出自密香树，这九种实为“木”一种。因无他本可据，条目暂从百川宋本。

果类十七种，竹类六种，凡八十种。本文就其可作粮食、糖料、瓜果、蔬菜、药材以及颇具南方特色的花木略加论说，以便了解这些作物对于供给人们多方面的生活资料，丰富各族人民的生活内容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，都曾起过现在还在起着的“天下之大业”③的作用。

作为粮食的淀粉性的主食作物，分为谷（古代称为“粒食”、“百谷”、“五谷”）和薯（包括块茎、块根）两大类。专记草木的嵇书，不记水稻而记甘薯，这是不难理解的，可是对记甘薯的意义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充分认识的。岭南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比中原地区稍为迟缓，而南方山陵与河谷错杂，在古代的条件下，虽限制了稻田的大规模垦辟，但却有利于块根块茎作物的普遍种植，所以薯类在岭南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有的地方还是主要粮食之一。查嵇书所记八十种，过百字者仅九种，甘薯即是其一，可见他对甘薯的重视。他对甘薯详加记述说：“甘薯，盖薯蕷之类，或曰芋之类。根叶亦如芋，实如拳，有大如瓠者，皮紫而肉白。蒸鬻食之，味如薯蕷，性不甚冷。旧殊崖之地，海中之人，皆不业耕稼，惟掘地种甘薯。秋熟收之，蒸晒切如米粒，仓囤贮之以充粮糗，是名薯粮。北方人至者，或盛具牛豕脍炙，而未以甘薯荐之，若梗粟然。大抵南人二毛（按：指头发斑白）者，百无一、二，惟海中之人，寿百余岁者，由不食五谷，而食甘薯故尔。”有人认为嵇含记述的甘薯就是今日的番薯④，似是误解。番薯原产地在拉丁美洲，这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。西晋时，美洲尚未发现，番薯亦未自原

③《盐铁论·水果篇》。

④此说见《广西日报》1963年6月9日第四版载《广西红薯何来》。

产地传入我国。显然，嵇含记述的甘薯，不是指番薯，而是指别一种作物。经我国农学家丁颖考证，应为薯蓣科的甜薯。嵇含说的甘薯特征，正和今日两广普遍栽培的食用甜薯相同。由于甜薯具有性平味甘，健脾胃，补肺肾等功能，南方近海居民又常食鱼虾，所以能收到延年益寿的奇效。长期以来，甘薯成了南方人民生活的重要来源，嵇含对甘薯的观察是很有眼力的。

糖料植物，嵇书所记只有甘蔗一种。虽此一种，因它是制糖的主要原料，关系民生颇大。嵇含下笔有味，象蘸了糖液书写一样，说“甘蔗，交趾所生者，围数寸，长丈余，颇似竹，断而食之甚甘。榨取其汁，曝数日成飴，入口消释，彼人谓之石蜜。”当时交州领有今广西一部分。岭南所产的竹蔗，除供生食，就是用于制糖。岭南种植甘蔗始于何时，不可考，但从蔗糖在秦汉时已运到中原来，可知公元前已经栽培。三国时，蔗糖是交州贡献孙吴的主要食品，是南北经济交流的重要物品，嵇含为文，特记汉代司马相如乐歌太尊蔗浆、吴国孙亮使黄门取蔗糖、扶南国（在今柬埔寨）向晋武帝贡蔗三事，他记蔗涉史，趣味横生。

南方盛产水果，其中鲜味珍果，早已载誉中原。嵇含记果，一腔激情，洒满纸上，甘蔗花大如杯，根大如车毂，特描柑橘的白华赤实，彩绘荔枝的青华朱实，高歌龙眼为荔枝奴（指龙眼熟在荔枝后），把一幅种属竞茂、花果争珍、各持本性、自得其妙的南土盎然生态的图景展现在人们面前，使你有身临其境之感。嵇含对这些果类经济价值的记述，脱出了一般人的局限，用其素有卓识的眼光，既说果品的食用和收益价值，又说它们为时人所珍的史事。如记荔枝“一树下子百斛”，记龙眼“一朵五、六十颗”，仅此数

语，收益之大可知。还有，他着重记叙了岭南向汉魏和六朝（指孙吴、东晋和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）的岁贡，诸如交趾有主贡御橘官长秩二百石，士燮向吴主献橘为群臣毕贺，汉帝用橘、龙眼、荔枝赏赐来朝的匈奴单于，魏文帝以龙眼荔枝为南方珍果诏谕群臣，六朝在华林园植柑，晋朝皇帝聚宴群臣以摘柑分赐为大庆等等，可知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品尝以此为上，赏赐亦以此为荣，移植不忌官苑，御贡特设专吏。就在这些士大夫品尝珍果的喜庆声中，隐藏着人间多少的辛酸！作为西晋一个重要官吏嵇含，却与那些品珍不顾人民死活的士大夫有所不同，他记汉武帝建扶荔宫种植荔枝时，不掩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暴行，并大加讽刺说：“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，无一生者。连年移植不息。后数岁，偶一株稍茂，然终无花实，帝亦珍惜之。一旦忽萎死，守吏坐诛死者数十，遂不复茂矣。”象荔枝、龙眼这类亚热带作物，只能在岭南、福建和四川南部等地开花结实，难以在北方越冬，即使偶而成活，也无花果。汉武帝不顾南方水果的生长条件，强行移植北方，萎死后仍不自悟，反与其愚昧无知嫁罪于下吏，诛杀数十人，充分暴露了他残忍的本性。对于珍果岁贡带给人民的痛苦，嵇含也述不遗笔地说：“其实则岁贡焉，邮传者疲毙于道，极为生民之患。”他如没有忧民的思想，何能出如此的语言？至于有些果类虽非士大夫所珍，却对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，嵇含则是另一番感情，如记槟榔是南方人用作敬客礼设和下气药钱，记椰树被俗称越王头的来历，记杨梅熟时，任人登采饱啖而不得带走，表明他对南方民俗是极为留心的。

蔬菜作为副食，对人们生活亦不可少，常菜更是百姓每餐的主要素设。嵇含对蔬菜的重视，从他书中记述各种蔬菜

的品类、特征、功效及栽培方法的详备，就可以看出来。薤菜是南方普遍常食的蔬菜，它性冷味甘，有水、旱两个品种。人们常食，不以为意，嵇含却能反常为奇，具体记述水薤的栽种方法：“南人编苇为筏，作小孔浮于水上，种子于水中，则如萍根浮水面。及长，茎叶皆出于苇筏孔中，随水上下，南方之奇菜也。”还说明薤汁有解毒作用，以世传魏武食薤后能啖一尺冶葛（毒草）为证。蔬菜不但指草本植物的茎叶乃至根部，还包括作菜的瓜茄和调味酱料。蒟，亦是南方蔬菜之一，加工成蒟酱（枸酱）可作调味品。据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所载，汉时“独蜀出蒟酱”，经夜郎行销岭南，而嵇书记载，蒟亦“生于番禺”，这就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。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记有蔬菜十四种，南方种植的蔬菜品类亦多，嵇含择其有代表性者书之，说茄（指灌木茄）“经冬不衰”，说蒹菜（南方人叫做睡菜）“夏生于沼间”，说橄榄“深秋方熟”。仅此数例，已反映出南方蔬菜随季品异，全年菜鲜的特色。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记载的蔬菜有三十一种，应看作是崔书嵇书的发展。

“药”字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字书《说文解字》里解释为“治病草”。可见植物性药材在医药学上的重要性。嵇书不是药物学专著，不宜用秦汉时人所作《神农本草经》对之责求，而要看到嵇书对发掘我国药物学遗产的用心，书中介绍了某些植物性药材，如薤花能破气消痰，录有泰康二年（公元281年）晋武帝试验有效而赐近臣为证。再如吉利草系解毒良药，也录有交广俚人用此草解畜蛊毒极验为证。益智子（又名益智仁）能温补脾肾，引交州刺史张津曾用益智粽餉魏武帝为例。举凡嵇书注明作药用的植物不下十种，每种药物，嵇含都注明其枝叶根茎花果形状特征、用药方法和已知

产地，这在当时瘴重毒漫，缺医缺药的越族地区，是有实用价值的。

竹木在岭南的经营，历史久远。西周时骆越就向中原进贡大竹，晋戴凯之撰有《竹谱》。嵇含书记竹六种，其如皆为草木，而对林木记述，和一般林学家不同的，是不多考虑其材用，而放眼于生长特点，以对桂树、榕树的描述最有代表性。嵇书所列举的丹桂、牡桂、菌桂三种，都是药用桂，和花木桂不同，正如他所说的那样，“桂出合浦，生必从高山之巅，冬夏常青，其类自为林，间无杂树。”由于当时广西的桂树不独生，生必一大片，“桂”与“林”自然联系起来。嵇含对合浦桂树生长特征的描述，对我们考究秦设桂林郡治于布山是可参证的。榕树是我国南方特有的风景树，嵇含以文代图，将其描述：“南海、桂林多植之。叶如木麻，实如东青。树干拳曲，是不可以为器也。其本棱理而深，是不可以为材也。烧之无焰，是不可以为薪也。以其不材，故能久而无伤。其荫十亩，故人以为息焉。而又枝条既繁，叶又茂细，软条如藤，垂下渐渐及地，藤梢入土，便生根节，成一大株，有根四五处，而横枝及邻树，即连理。南人以为常，不谓之瑞木。”今天读来仍令人称赞，南方人亦当为之振奋，怎能不珍惜故土一草一木。

花卉庭园的布置，是我们祖先的优良传统，是我国植物学卓越成就之一。嵇含在这部书中，对于各种花卉的花色、花香的记述不少。论花芳香以耶悉茗花和末利花为第一。因其花芳香，竞相种植，陆贾《南越行记》也特赞“此二花特芳香者”。论花之美，以水莲、水蕉为最。引得吴国孙休曾多次遣使到广州取水莲、水蕉北植，取回去没有栽培成功，只好画图贡献。岭南气候温暖，历来又有栽培花卉的传统，所以

四季花开，芳香扑鼻，百花争艳，万紫千红。看来嵇含被南方四时的花卉世界倾倒了，他书草类结语就盛称：“凡草木之花者，春花者冬秀，夏花者春秀，冬花者秋秀，其花竞岁。故妇女之首，四时未尝无花也。”

嵇含在总结岭南植物学方面，是有成就的，成为我国植物学的一份珍贵遗产，有很多就为唐刘恂《岭表录异》、宋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所采用。但是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也由于对某些植物得自传闻，在描述和推断时，不可避免地发生某些差误，对某些植物功效也还夹杂着一些迷信的糟粕。例如：说妇女怀妊，佩水葱花生男孩灵验，这未免有些荒唐。又说，媚媚草上有虫，老蜕为蝶，赤黄色，女子将它收藏，叫做媚蝶，能博得丈夫怜爱，这同样是欺人之谈。剔除书中夹杂的某些糟粕，继承他这份遗产，在现在仍大有用处的。

令狐熙

李炳东

令狐熙，字长熙，敦煌人。西魏大统五年（公元539年），出生在一个豪门世族之家。父亲令狐整，做过北周的大将军、始丰二州刺史。令狐熙性格严谨庄重，颇有风度，仪表端严，衣着整洁。平生交游宾客，多是当时名士。他博览群书，知识渊博，对“三礼”（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和《礼记》）造诣颇深，他且善于骑射，还有音律修养。按封建的伦理道德标准，他是一位孝子，父母在世时，就尽了孝道，父母逝世时，他更是悲痛欲绝。

北周时，令狐熙历任吏部上士、帅都督、辅国将军、勋部吏部二曹中大夫等官职，俱以精明能干见称。杨坚代周自立，建立隋朝，令狐熙被派任沧州刺史。沧州豪族，依靠权势，称霸乡里，荫庇民户，大招私属，州郡簿籍所记的户口，比实际户口要少得多。令狐熙根据朝廷谕旨，减轻课税，少征徭役，使私属自动脱离豪族的荫庇，另立户籍，这样一来，州内增加了一万民户。在职数年，风教大洽，政绩称著。开皇四年（公元584年），隋文帝驾临洛阳，令狐熙前去谒见。下吏和一般绅民以为他被转调，在道旁哭泣。他们见到令狐熙朝见回来，“出境迎谒，欢叫盈路。”开皇八年，令狐熙被调任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，“吏民追思，相与立碑颂德。”后来又调升鸿胪卿兼吏部尚书，判五曹尚书，

亦以精明能干著称，甚得隋文帝的信任。隋文帝去泰山祭祀，返回时寓宿汴州，看见汴州地方富庶，但坏人和侠客不少，特派令狐熙为汴州刺史。他到汴州后，禁止浪子游食，不准工商盲目发展，不准民户弃农经商，把流入城市的乡民遣返原籍种田，整顿州内吏治，整顿社会秩序，结果社会风气大变，“称为良政。”开皇十五年，令狐熙来朝，他的政绩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，得到绢帛三百匹的奖赏。

隋开皇十七年（公元597年）令狐熙被派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，任职五年，也有显著的成绩。在隋统一岭南之前，东晋和南朝（宋、齐、梁、陈）主要是依靠各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去管理岭南各地，因此少数民族的首领都有极大的权力。陈朝立国者陈霸先，曾为梁末岭南西江督护、高要太守，和当地豪酋峒主关系十分密切。他作梁相时，又函邀他们及其子弟赴建康（今南京）旅游。陈霸先称帝后，所委派的岭南郡县官员，大多是这些少数民族首领。隋灭陈后，在岭南各地进行过某些改革，损及这些豪酋峒主的政治经济利益，因而引起隋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矛盾。开皇十六年，桂州俚帅李光仕起兵反抗，隋文帝派遣上柱国王世积与前桂州总管周法尚率兵讨伐。原计划法尚所部从岭南出发，世积所部从岭北出发，约定会师尹州（治所在今广西贵县）后再协同进击。世积所部因染瘴疫，被迫驻扎衡州（治所在今湖南衡阳），法尚所部只好单独推进。另外，隋文帝又派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募兵，共讨李光仕。法尚、何稠率领的隋军，很快就击败了李光仕，桂州全境平定。这次用兵，虽然打击了桂州少数民族酋豪中的分裂割据势力，但是，多年战乱的伤痕尚未医治，民族之间的隔阂也没有消除。这些都急需隋朝继续采取措施加以解决。因此隋文帝十

分注意缓和岭南的民族矛盾，于是决定调政绩卓著的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。这是当时治理广西的最高军政长官，隋文帝又“许以便宜从事，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”，使他更得以施展才能，做出成绩。按照隋朝的吏选制度，全国州县官吏的任用，均属吏部职权，地方长官不得自用僚佐，县佐回避本郡。因为就地任用僚佐，自然多是本地豪强。隋制这个规定使本地人不得直接干扰本地的政务，以便加强中央集权，有利于地方吏治的改善。但是，在岭南少数民族地方情况比较特殊，不但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迟缓，甚至部落制度还完整地保存着，民族之间、部落之间的隔阂也很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只用中原人，不用本地少数民族首领做官，隋王朝就很难团结各少数民族，保持国家统一、社会安定和边防巩固。隋文帝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，授予令狐熙任用州县以下官吏的权力，还给他的军用营帐配备了五百人，赐帛五百匹，派驿车送他的妻儿还乡，并封他为武康郡公。这些都是朝廷对令狐熙的奖励。

从前某些来广西任官的州镇大吏，对少数民族多是以兵威相胁，视为仇敌，造成很坏的影响。令狐熙却与此不同。他不仅不歧视少数民族，而且对少数民族首领推心置腹，耐心开导，以理服人，大施恩信，因而很快声传南土，获得各少数民族首领的拥戴，相率归附，感慨地说：“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，今者乃以手教相谕，我辈其可违乎？”因此，以前长期“寄政于总管府”而不能到各县州执行职事的官吏，现在都可以回到所管的州县去任职视事了。令狐熙一面责成各州县长吏到职工作，同时又拨出财政经费，为各州县“建城邑，开设学校”。结果，“华夷感敬，称为大化。”

宁猛力是钦州少数民族俚人的首领，“与陈后主（陈朝

最后一个君主陈叔宝)同日生,自言貌有贵相。”隋文帝为了争取他,便委署他为安州刺史。但是,宁猛力凭险自固,不肯去桂州参谒总管。令狐熙亲笔写信邀他前来会见,表示以礼相待,结交情谊。当时猛力母亲身患热病,令狐熙又派人赠送药物,终于感化了宁猛力,赶紧到总管府求见,心悦诚服,从此便归附隋朝。令狐熙又奏准改安州为钦州。

令狐熙在桂州总管府工作数年,对待少数民族以诚相见,平等相待,修建城池,兴办学校,传播汉族文化,改革不良习俗。这些措施都增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和睦,安定岭南社会,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。他和当地士流,交往密切,足迹所过,声名广传。但他自觉岁数大了,又体弱多病,继续担任现职,己力不从心,就上表给隋文帝,词意恳切,请求辞职,奏说:“臣忝寄岭表,四载于兹,犬马之年,六十有一。才轻任重,愧惧兼深,常愿收拙避贤,稍免官谤。然所管遐旷,绥抚尤难,虽未能顿革夷风,颇亦渐识皇化。但臣夙患消渴(以渴饮多尿为主症的一种疾病,常见于糖尿病,尿崩症),比更增甚,筋力精神,转就衰迈。……请解所任。”他的请求,隋文帝没有批准,只赐药物治疗慰问。但他仍服从朝廷旨意,坚持职守。

仁寿二年(公元602年),隋文帝令交州俚帅李佛子入朝。佛子因准备起兵作乱,诈请允许推迟到仲冬启程。令狐熙不了解真实原因,遂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当时,有人到朝廷诬告令狐熙接受佛子贿赂,才同意佛子推迟入朝日期。隋文帝轻信诬讼,对令狐熙产生了怀疑。不久,佛子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,隋文帝大怒,以为这是令狐熙受贿的明显罪证,就派遣使者去桂州,把他枷锁到朝廷论处。令狐熙个性刚强,受

不得冤枉，由于忧郁不能自解，行至永州（今湖南零陵），终忧愤成疾，含冤而死；终年六十三岁。隋文帝仍怒气不消，诏令没收其家财。瓜州（今甘肃敦煌）刺史刘方受诏为交州道行军总管，统兵二十七营前往交州讨伐，佛子被迫投降，刘方把他送至京师长安，经审问证实“熙实无赃货”，文帝才醒悟过来，召见其四个儿子，授以官职。令狐熙冤死，终于得到昭雪。

本文引文，均见《隋书·令狐熙传》。